

萧乾 著

独步

世界大战中的

欧洲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独步 世界大战中的 欧洲

萧乾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步世界大战中的欧洲/萧乾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16-04233-6

- I. 独…
- II. 萧…
- III. 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现代
-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613 号

独步世界大战中的欧洲

萧 乾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 毫米×1015 毫米 1/16
字数:303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9.75
插页:1

版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000

定价:30.00 元

书号:ISBN 7-216-04233-6/I·375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文洁若

今年是二战胜利 60 周年。1 月 28 日的上海《文汇报》详细报导了 44 个国家或政府领导人一起参加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纪念活动的情况。参加者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当年打开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门的苏联老红军战士，两千来名当初集中营的幸存者，许多国家青年团体的代表，以及本地居民。这是二战结束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举行的最为隆重的纪念活动。

爱尔兰总统麦卡利斯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国家的官僚，像其他许多国家的一样，躲在了官僚体制之后。我们躲在虚辞之后，我们没有做那些能够做也应该做的事情，爱尔兰应该为二战中所做的许多事感到羞愧。”

二战期间，爱尔兰出于本身的利益，对纳粹德国的态度暧昧。现任总统主动地为前人承担责任，显示出高风亮节，赢得全世界的尊重。

《文汇报》在同一版刊出震海的《知耻而后勇》一文，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达 600 多万。“然而，战后德国政府敢于正视历史、真诚接受历史教训的一系列举措，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立法铲除纳粹可能滋生的土壤，在国民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展开公正的历史教育，无条件支付约合 400 多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以示赎罪。”

作者最后写道：“平心而论，如今绝大多数德国人、日本人都不必为他们的国家在历史上犯下的侵略和大屠杀罪行而受到指责。但是，他们，特别是政府的领导人应该承担一种特别的责任。施罗德说得好：“记住纳粹时代是精神上的义务——我们不仅仅亏欠（集中营、大屠杀的）受害者、幸存者，也亏欠自己。”

“‘知耻而后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勇于自我反省是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也只有勇于自我反省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谅解和尊重。否则，将继续‘亏欠自己’，‘亏欠’他人。”

澳门《正报》于 1 月 27 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日与德相比显得不光彩》的报道，全文如下：

“联合国大会 24 日举行特别会议，纪念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德国在此次会上勇于反省，强调绝不会忘记过去种种可怕的暴行。今年也是中国抗战胜利 60 周年，但是日本至今仍没有就侵略行为向中国道歉。有人认为，与德国相比，日本的行为显得很不出彩。”

“根据波兰历史学家最新研究，奥斯威辛集中营共有 130 多万人被关押，其中 110 多万人在集中营丧生。德国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 24 日表示，奥斯威辛集中营将作为种族大屠杀和极端藐视人性的象征而在人类历史上遗臭万年。他表示，发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暴行永远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战后德国已经从中总结并吸取了教训。”

“在纳粹势力肆虐欧洲时，亚洲国家及人民同样陷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凌辱及屠杀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下，中国人的死伤人数多达 3500 万，其中南京大屠杀有 30 多万人遇难。日本军国主义 60 年前在亚洲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然而，同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及战败国，两国政府对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二战的理解和态度却截然不同。”

“从过去的德意志联邦到现在的德国领袖，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进行深刻忏悔。德国还制定相关法律，防止纳粹沉渣泛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战争赔偿态度也是相当明确的，先后向波兰、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尤其是受害的犹太民族赔偿近 550 亿美元。”

“反观战后的日本，历届日本政府从首相到阁员，从来没间断过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 14 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的右翼势力一直在教科书上做文章，篡改日本侵略的历史，美化日本侵略的历史。民间赔偿更是不用谈了，就连一个“慰安妇”的赔偿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在没有正视历史问题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近年仍积极促成修改宪法，扩充军事实力。”

“难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此次纪念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会议上发言时强调，60 年后，纳粹主义及军国主义仍阴

魂不散,一些极右势力及组织企图歪曲、否认罪恶历史,挑战人类良知,国际社会不得不提高警觉。他还引用中国古语‘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以史为鉴,知耻后勇’,敦促有关国家认真吸取历史教训,迈向和平发展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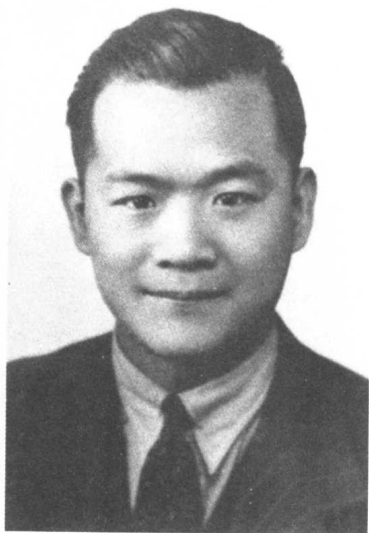
萧乾于1995年8月15日写了一篇题作《倘若我是一个日本人》的千字文,发表在9月3日的《新民晚报》上。转年6月,该文获“雪津杯”杂文征文一等奖。8月,在全国第八届中国报纸副刊作品奖评选中获二等奖。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自2001年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每年都去充满争议的靖国神社拜祭包括战犯在内的阵亡军人。从此,我国领导人一直拒绝与他定期举行首脑会谈。

鉴于《倘若我是一个日本人》比十年前更具有针对性,借着《独步世界大战中的欧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机会,作为附录(一)收在书中,以飨读者。附录(二)《萧乾和史迪威将军之女——建立在两条公路上的跨国友谊》则是笔者参考萧乾的挚友吕德润先生所著《远征缅北》一书写成的。

《大公报》的同事中,吕老是几十年来跟萧乾的关系最密切的一位。进入晚年,1986年吕老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90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萧乾生前,与吕老在同一座楼里办公,经常一道开会或参加外事活动。谨在这里祝愿奔九十的吕老健康长寿。

2005年2月18日



作者简介

萧乾(1910—1999年)

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记者，原中央文史馆馆长。于30年代步入文坛，与沈从文被归类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在1939年至194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讲师，并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时值二战，他以战地记者驰骋欧洲战场，亲历了：挺进莱茵河、诺曼底登陆、波茨坦公约会议、纽伦堡战犯审判、联合国成立大会等传奇般的历史时刻，是中国唯一经历欧战全过程并写下了几十万字纪实文学的作家和记者。

萧乾一生著作甚丰，青年时代以撰写欧战名篇名重一时，晚年则因与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现代派巨著《尤利西斯》，举世瞩目。

独步世界大战中的欧洲

目录MULU

1	序	文洁若
1	1	一个中国记者在二次欧战中的足迹
11	2	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观感
21	3	《慕尼黑协定》——二战的前奏
23	4	力挽狂澜的丘吉尔
29	5	顶天立地戴高乐
37	6	混世魔王希特勒
41	7	纽伦堡审战犯
47	8	二战史话
51	9	剑桥书简
57	10	矛盾交响曲
63	11	血红的九月

独步世界大战中的欧洲

- 71 12 伦敦三日记
- 77 13 银风筝下的伦敦
- 85 14 一九四〇年的圣诞
- 89 15 欧洲往哪里去
- 95 16 战时英国印象
- 101 17 科学在第二次大战中
- 105 18 战争与宗教
- 111 19 滇缅路开放之前
- 117 20 妇女在战争中
- 123 21 活宝们在受难——空袭下的英国家畜
- 127 22 舆论·广播·宣传
- 135 23 进攻的故事

- 143 24 一九四〇年欧洲稗史大观
- 155 25 疏散与失学
- 159 26 到莱茵前线去
- 170 27 南德的暮秋
- 213 28 柏林那趟
- 221 29 欧战杂忆
- 235 30 达豪余生
- 243 31 欧行冥想录
- 253 32 北欧来鸿
- 257 33 在洋山洋水面前
- 265 34 我的旅行记者生涯
- 301 附录一 倘若我是一个日本人
- 303 附录二 萧乾和史迪威将军之女 文洁若

一个中国记者在二次欧战中的足迹

一九三九年八月,正当日军入侵湘北,深圳失守,花县告急之际,在欧洲,希特勒这个恶魔鲸吞了捷克之后,又扑向波兰。间歇了二十五年之后,二次欧战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看来又一场大规模流血已是无可避免的了。这时,许多旅客挤在九龙法国邮船公司门前要求退票,我却买到一张经马赛—巴黎去伦敦的通票。上船之后才发现偌大一条豪华邮轮,头等舱空空荡荡,三等舱也只有我们几个东方人:除我之外还有些新加坡和印度的旅客。唯一高鼻梁蓝眼珠的原来是个上海白俄舞女的私生子。他听说法国在招募雇佣军,想投奔去混个国籍。

果然,开船第二天,就从播音器里听到英法相继对纳粹德国宣战的消息。于是,船上马上宣布晚间甲板上连烟也不许点,每天早晨都得做邮轮万一遭敌鱼雷击中时逃难的演习。马赛、巴黎,到处灯火都在管制,整个西欧是一片漆黑。

1939年秋,萧乾初抵英国。请他去执教的东方学院为了躲避空袭疏散到剑桥大学去了。萧乾(左一)、于道泉(右一)、吴元礼(左二,《大公报》老板吴鼎昌之子)在哈密尔顿村的住所与其他二人合影。





英国这个岛国要靠船队穿过U字鱼雷阵来供养它的居民,此时移民局奉令拒收非英籍旅客登岸是可以理解的。怎奈我持有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聘书,又有香港《大公报》特派员的记者证。官员不甘心地在我的护照上批了“准许停留两个月”,而我这一“留”却住了整整七年。

坐在开往伦敦的火车车厢里,摸着黑同邻座的女乘客攀谈起来。原来是嫁给英国人的一个希腊妇女,她这是刚从娘家归来。她一再问我:这仗得打到哪年啊?我告诉她我刚从中国来,我家里已经打了两年仗。如今仍在激战着。侵略者要奴役,我们不让,所以就只好打。

三九年冬天我经历的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除了灯火管制和食物配给使人意识到是在战时之外,整个西欧没一点点硝烟味儿。圣诞节我从剑桥去伦敦观光,街上一片漆黑,游艺厅内可还是载歌载舞。

四〇年一开春,掌握着主动权的纳粹精锐部队就开始了他们蓄谋已久的闪电战,不多日就横扫半壁欧洲。五月下旬,盟军丢盔弃甲,狼狈撤到敦刻尔克海岸。浩浩荡荡的英法联军竟打得剩不到四十万人。直到六月上旬才陆续乘二百四十三艘大小船只逃回英伦三岛。我当时所在的剑桥正好临近东海岸。一天大早,市中心广场和人行道上净是满身污泥的败兵残将。我跟剑桥市民一道,也提了热水瓶前往慰问,一边往他们举着的缸子里倒水,一边向勇士们表示敬意。

伦敦大学是为了逃避战祸才疏散到剑桥的。可不料就在伦敦大轰炸的一个月前,大学当局竟决定迁回京城了。这么一来,那场号称“不列颠之战”的大轰炸我也赶上了。那确实是二战的一大关键。正如后来在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的血战一样,倘若伦敦——当时反纳粹战事唯一的堡垒,没能顶住,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也就没戏了。然而那座包括大陆难民在内住了上千万人的都市,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地狱般的夜晚,成百上千的U字轰炸机轮番不知丢下多少吨炸药。那阵子我如果不是夜夜睡在地铁站台上,也早已粉身碎骨了——我在汉普斯特德的住所两次中弹,还曾挨过一颗烧夷弹,可我算命硬。每天早晨我都踩着瓦砾去东伦敦踏访,然后向重庆的《大公报》的读者报告英国公民在战时的良好纪律及饱满的士气。他们在没有了屋顶的家里还向我伸出象征着胜利信念的大拇指。我在英国的那些年头是英国在物质上最匮乏的日子(一个月吃不上几片肉!),然而精神(士气)上,那也是他们最伟大的时刻。

1942年，萧乾在剑桥大学与林苍祐（前排右一）及其他三位朋友合影。



苦难中的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仍是关切的。那时我经常应援华会之邀，赴全英各地宣讲中国人民英勇抗敌，他们显然从中也得到鼓舞。但是一九四〇年七月，丘吉尔为了保全英帝国在远东的属地而绥靖日本，悍然不顾道义封锁了我们用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切断抗战中仅剩的对外孔道，等于掐断了我们的喉咙。英国人民为了表示义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

四二年到四四年我去剑桥读书的那两年，战事转向苏联和中东、北非。中部工业城（如伯明翰）虽然不时也仍遭敌机轰炸，但纳粹主力已转到东方去了。那阵子我成天披着黑袍，坐在我那间十四世纪的书斋里，钻研起世纪初的西方意识流小说。

诺曼底登陆前夕，《大公报》的胡政之先生一天踱进我在王家学院的书房，向我挑战了。他说，第一次欧战给我赶上了，这回该轮到你了。你肯不肯——敢不敢脱下你这身道袍，换上军装，放弃那个回国后一点用也没有的学位，代表报社到欧洲战场上去驰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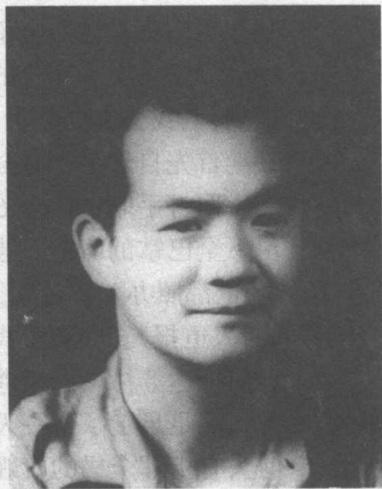
我接受了他的挑战，并且马上去英国新闻部办了由兼职的驻英特派员改为正式的战地记者的专职。我把黑道袍往箱笼里一塞，就搬到



伦敦，在报社林立的舰队街开了办事处，物色了几位当地的助手：有管电报的，还有管招徕广告的。当时英国厂商绝没料到大战之后中国还要接着打内战，都在抢战后的中国市场，所以广告户络绎不绝，以致我这家《大公报》伦敦办事处不但能挣出开销，自给自足，后来还给报社买了彩印机和汽车。

联军新闻部派我随正在由法国东部准备攻入莱茵的美军第七军(军长派赤)行动。在巴黎，我还和也是一身戎装的老师斯诺欢聚了半日，然后就动身去追赶前进中的部队了。那时，再没有比“联军记者证”更灵的东西了。一路不但交通免费，沿途凭证食宿也全没问题。这当儿，纳粹军队已成丧家之犬，一路不见败军的踪影。我追到南锡，那里的兵站告诉我第七军刚开过。再往东的铁路就炸断了，要我沿公路去搭乘军用卡车。反正地面上的纳粹部队早成了强弩之末，夹着尾巴后撤，到处是炸毁的坦克残骸，有的还在冒着烟儿。法国东北部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也不见H字敌机。一列卡车从后面开来。我侧过身去挑了挑大拇指，卡车见我身穿军服，肩上是“中国记者”的肩章，就立刻停了下来。车上载的全是一箱箱炸桥用的黄色炸药，开车的都是黑哥儿们。我就坐在TNT木箱上一路赶到凯撒劳吞，总算找到了第七军的记者团。我们驻扎在德国铅笔大王法布尔(Faber)的宅邸。主人自然早已逃得不见踪影。拉开抽屉，连假牙他都没顾得戴，可见临走时多么狼狈慌张。

现在真难设想我年轻时的精力。进驻之后马上用电报同刚刚在舰队街开办的《大公



1944年6月，萧乾放弃了即将到手的硕士学位，重操记者旧业，随盟军挺进莱茵河。这张照片摄于1946年3月。

报》办事处联系上,然后就发出第一通“本报记者来自前线电讯”。照我预先安排的,伦敦收到我的电文后,马上就转发重庆。这封电报很长,我是分两截打的。不幸我在伦敦的助手只顾抢时间,竟把前后两截电报次序颠倒了。后来知道,尽管文不接气,《大公报》居然有记者从德国前线发回电报了,就还是照登并引起了轰动。

我原以为到了前线,我凭“战地记者”身份就能在工事里东钻西钻,也沾上点现代战争的征尘呢。其实,联军记者团离前方还有一段距离。只听得一声声炮响,却不见炮身。莱茵美酒却喝个够——只是原主人失陪了。在那里,行动并不自由。新闻发布官除了每天几次报告前方军情,其他时候他就陪我们喝酒聊天,也许还变相监视我们的活动。自然,像美联社、路透社那样的大通讯社,必然各有特殊的渠道线索,我来自东方黄脸皮的单干户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来体验一下战场的气氛罢了。不但白刃肉搏的场面不会见到,就连战壕也无法涉足。

四五年二月,正当第七军准备展开莱茵大桥争夺战然后向柏林挺进之际,伦敦办事处忽然来电,说重庆《大公报》要我火速赶回伦敦。我感到愕然,但只好告别前方,绕道比利时奔回伦敦。原来重庆报馆要我驰往美国去采访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而且《大公报》社长胡霖也将参加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当时已有《大公报》常驻美国记者杨刚,调我去估计是为了陪陪胡老板。

首先自然是先赶办护照。在美国驻伦敦的领事馆里,我那是生平头一回打手印:不是仅仅按按大拇指,而是在整个手掌上都涂满油色,留下全巴掌的印记。当时非美籍的记者(如流亡伦敦的法国及波兰记者)也都照办。记者团共二十余人,其中包括英共的《工人日报》和法共的《人道报》。通知要我们先赴伦敦一个专通往海口的秘密车站。火车天明抵达苏格兰西岸港口哥拉斯戈。平时横渡大西洋航程只需六七天,可我们足足走了十一天,那是个庞大的护航舰队——听说共五十八艘。前头有指挥全局的旗舰,两侧有军舰护卫。当时德陆空军虽已打得精疲力竭,海军却仍很猖獗,鱼雷艇四下出没。所以上船后白天要演习逃生,晚上只准和衣而眠。另外还有个不少同行难以忍受的禁令:不许喝酒。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四月十二日那晚,适逢同行的一位记者过四十整寿。于是,就由舰上做东,并且让我们“敞开喝”。战时由于死亡常在



1936年，萧乾与《大公报》同仁合影。第二排右十为萧乾。

身边打转，何况又漂在大西洋中心，随时可能喂鲨鱼。大家就边喝边醉醺醺地唱起酒徒歌曲。尽管都是男性，还有人挽腰翩翩起舞。

真正是乐极生悲！而且并非遇上了鱼雷艇。大家正在兴头上，舰长垂头丧气地踱进舱来，击了一掌，然后用低哑的声音宣布：“先生们，刚才听到广播播出一个不幸的消息：罗斯福总统去世了。”大家听了也都黯然散开。酒会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是在加拿大东岸哈利法克斯港登的陆，而且自开战以来，第一次吃到真正的牛排，印象中似乎有砖头那么厚实，而且细嫩滋润。在多伦多，我去参观了一位加拿大神父建立的中国乐器博物馆，至今仍记得挂在壁上的那把马头琴，说明书上写着鼓面是分别用男女人皮制作的。

那是我生平第一回踏上新大陆，心下充满了好奇。在芝加哥科学博物馆，我曾钻进一只潜水艇；在丹佛，瞻仰了多妻教摩门圣堂。两天后，抵达目的地旧金山，并且见到老板胡霖。

除了轴心国家之外，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派出记者并且集中住在斯奎利伯旅馆，中、苏及英国代表团则住在马可·哈帕金斯旅馆。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是外长(原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团员除属无党派的胡霖外，还有中共的董必武和民社党的张君勱。我每日在下榻的旅馆里用早餐，然后就去陪胡老板。中午和晚上我们总是去华人街的杏花楼吃中餐。董必武每餐都同我们一道吃。当时陪董老的还有来自延安的章汉夫和陈家康。席间时而谈重庆，时而交换对美国的观感。董老总是满面春风，可是一件事却确实把他惹火了。

我在燕京读新闻学时，课本上总是讲美国记者在报道时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新闻要真实，不容许虚构捏造。而当时竟有两家美国报纸编造了《董必武访问记》，其中之一还借这位中共领导人之口，大肆攻击苏联。真是令人愤慨！

大会开幕前几天，不断有当地华侨开车陪我们去游旧金山：海滨风光，脱衣舞，同性恋者的剧院，所有他们心目中的“精华”都观赏到了。有一天他们开了两个小时的车请我们去一家名菜馆吃龙虾。当我们正在用心剥壳之际，餐馆的美国老板跑过来，把一坛贴了红纸的绍兴酒捧到我们桌边。然后双掌合十深打一躬说：原来你们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光临小馆，请容许我略表敬意。

就在这时，我从事记者生涯以来头一遭抢到一条独家新闻。当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向宋子文敬酒时，他说了一句“欢迎中国代表团到苏联来商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老记者胡霖正在旁边。他急忙传给了我，我立即往重庆发了个“特急电”。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歌剧院隆重开幕了。请允许我抄录那天下午五点二十分我往重庆《大公报》发的电文：

下午二时，突然落雨。一些政治悲观论者认为是不祥之兆。但会议开幕前，阳光又普照大地。旧金山行政中心显得整洁爽快。会议定四点半开始，三时左右歌剧院中已挤满了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八百余名记者先入了席，摄影记者们忙着抢有利角度。楼梯口站着担任维持秩序的是着敞领海军服的红十字女郎。在这庄严的歌剧院的台上，是天蓝色的